

存在与想象：泉州元代涉海墓志碑刻的历史书写

陈丽华

提 要：史料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均表明，泉州不仅是元代最大的贸易港口，也是各国使者频繁进出的外交口岸。1953年发现的“奉使忽鲁谟斯”碑无疑是学者研究元代泉州历史必引用的文物资料。数十年后，“盛柔善墓志”以及“许静山墓志”两方碑刻的出现，为研究元代泉州历史再次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二位墓主都与元代著名的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密切相关，前者是他的妻子，后者是他一手提携的官员。基于泉州的特殊地位以及亦黑迷失在海外事务中的权势，加上许静山出使异域与杨枢护送伊利汗国使臣回国均发生在大德八年（1304），这种历史巧合似乎告诉我们，他们执行的是同一使命。

关键词：泉州港 墓志 忽鲁谟斯 亦黑迷失 许静山 杨枢

泉州港在元代盛极一时，既是世界的货舱也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国际都市。保留至今的元代涉海碑刻，纪录了这一时代泉州港在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

泉州是元朝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1277年（景炎元年、至元十四年）初，主宰泉州港经济命脉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率当地实力派弃宋降元，蒲寿庚连同其兄蒲寿晟因此招致后人无情抨击。明太祖禁錮“蒲氏及其党孙慎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①然而，正是这位异族者的举动，使泉州城避免了有如广州遭受的那般重创，使南宋以来海外贸易兴盛的大好局面得以延续。

事实上，泉州港一开始就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当华南一带还是烽烟滚滚的时候，即下令首先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并派蒙古人、银青光禄大夫忙兀台主持；随后于庆元、上海和澈浦三处设市舶司，命福建安抚使杨发监管。泉州港扶摇直上，迅速超越广州。元人吴澄云：“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②庄弥邵则以“梯航万国”、“东南巨镇”，^③描述泉州既是世界商品的集散中心也是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元政府在泉州至杭州的海道上，建立15个海站，每站置船5艘，水军200人，专运国外进贡物品和商贩奇货，以确保海上运输安全，各种货物在泉州集散，经杭州直抵大都。除了看重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作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也在忽必烈战略谋划的考量之内，例如至元三十年（1293）的

①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引《宋元通鉴》。

②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六《元庄弥邵罗城外壕记》。

爪哇之征,即从泉州后渚港集结启航。

泉州港也是元朝招徕海外诸国的外交口岸。忽必烈时代亟欲同南海诸国建立贸易关系,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元世祖特诏令唆都、蒲寿庚等:“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①随后,朝廷几次遣使往南海诸国进行“招谕”活动,使臣们大多从泉州港进出,且多倚重泉州人氏。如: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蒲寿庚亲信万户孙胜夫(泉州人)陪同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与唆都等出使占城。^②至元十七年(1280),授哈撒儿海牙为俱兰宣慰使,偕同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出使俱兰国(今印度西南岸奎隆)。次年正月,自泉州入海,途中改变直航俱兰的计划,到达马八儿国,其国宰相马因的对元朝使者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③可见,泉州同马八儿国贸易常有往来。同年,泉州永春人尤永贤入觐,授为占城、马八儿国宣抚使,奉旨招谕。^④至元十八年(1281),蒲寿庚的长子蒲师文奉命以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的头衔,与副使孙胜夫、尤永贤等抚宣海外诸国。随后,南海诸国除爪哇外多遣使来朝。^⑤至元十九年(1282),宣慰使尤永贤等再次出使马八儿国,船经占城时,不幸被执,引发朝廷出兵讨伐,越年被杀。^⑥元政府连续派出以泉州人为主体的使团,说明泉州港在南海诸国中的影响力。在使臣们的友好沟通下,元政府同海外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仅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海外国家派遣使节来访的达十国之多。^⑦汪大渊曾先后两次从泉州港附舶海外,行迹几半天下,根据他在《岛夷志略》中的记载,可知14世纪20—30年代,将近百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有商贸往来。^⑧

元代,海外诸国遣来使者也大多从泉州港进出。如马八儿国宰相不阿里(即李哈里,1291年从泉州登陆投奔元朝,1299年葬于泉州^⑨),以及被誉为中世纪西方旅行家的马可·波罗(1291年从泉州出海)、鄂多立克(约于1322—1328年从泉州上岸后游历中国)、马黎诺里(1346年由泉州启航)和伊本·白图泰(1340年从泉州登陆,1346年从泉州回航),他们无一例外都从泉州港启航或登岸,在他们的游记或见闻录中均描绘泉州港的繁荣,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

泉州更是元代多元文化相遇、碰撞、融合的典型国际港口都市。南宋时,泉州已是

① 《元史》卷一〇《世祖七》,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204页。

② 《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三·占城》,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4660页。

③ 《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三·马八儿等国》,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4669—4670页。

④ 《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旧首本《世系录·元镇国将军加九锡充马八儿国宣抚使贤公传志》,泉郡济东口同文斋石印,第94—95页。

⑤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吴序》,中华书局,2000年,第5—6页。此次出使时间为“至元十八年”,系根据尤永贤于至元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使时间判定。

⑥ 《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三·占城》,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4661页。

⑦ 《元史》卷一四《世祖十一》,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292页;卷二一〇《外夷三·马八儿等国》,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4670页。

⑧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序论》,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

⑨ 刘敏中《中庵集》卷四《碑三·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布哈尔(不阿里)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人物庶繁，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①到了元代，随着海外贸易的极盛，大批外国人聚集于此，他们来自阿拉伯地区、印度半岛、东南亚，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服饰不同，尤以波斯和阿拉伯人居多，故时人诗云：“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②这一时期泉州侨民的成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信仰所采取的宽容政策，使泉州成为世界多种宗教在东方国度里重要的传播据点，多教并存，教寺林立，竞相发展。

据至正十年（1350）吴鉴《清真寺记》载：“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可见阿拉伯穆斯林人数之多以及伊斯兰教在泉州的发展盛况。《鄂多立克东游录》和泰定三年（1326）泉州主教安德鲁的遗札，俱称泉州有基督教堂两所，而至正六年（1346）来到泉州的马黎诺里则记载此地有教堂三所，说明元中叶以后基督教（包括聂士脱里派和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在泉州也相当盛行。据考古发现和《清源金氏族谱》的记载，元代泉州至少有一座“备极壮丽”的印度教寺，同时印度商人1281年（释迦历1203年）创建湿婆神庙的泰米尔文碑铭，都表明印度和泉州商贸往来的频繁程度。泉州还是元代摩尼教最重要的教区之一，为此朝廷在这里设有管领江南诸路明教、景教等的教务大总管，而天主教神甫安德鲁遗札中的那句“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③则表明泉州当时也有犹太教徒和教寺，是可信的。

作为中世纪闻名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涉海碑刻不在少数，这些碑刻纪录了自五代以来泉州港发展、兴盛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其中，泉州元代的涉海碑刻类型主要集中于外国侨民的墓碑和墓志，它们不仅反映元代泉州社会状况，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二

历史的不幸最终还是降临到少有战火弥漫的泉州，元末一场长达10年的“亦思巴奚”（Ispahan）战乱，给泉州港带来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加之明初的排外风潮之后，无数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典籍在劫难逃，毁于一旦，只有一部分烧不掉的石刻幸运地留下来。今天，泉州发现并保存的元代时期各种外来宗教碑刻（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因而一直倍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些碑刻以墓碑为主，墓主包括商人、贵族、传教士、水手、平民等，有男性也有女性。碑刻的文字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叙利亚文、拉丁文、蒙古八思巴文、回鹘文、泰米尔文、中文，有的混刻多种文字。从碑铭信息显示，他们来自也门（Yemen）、哈姆丹（Hamdan），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al-malaq），亚美尼亚的哈拉提（Khalat），波斯的施拉夫（Siraf）、设拉子（Shiraz）、贾杰鲁姆（Jajarm）、布哈拉（Bukhara）、花刺子模（Khorazm）、霍拉桑（Khurasan）、伊斯法罕（Isfahan）、大不里士（Tabriz）、吉兰尼（Jilan），意大利的佩鲁贾（Perugia），印度的泰米尔（Tamil），等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多是从海路

① [宋]郑侠《西塘集》卷八《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② [元]释宗泐《全室外集》卷四《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③（英）阿·克·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来到泉州的。^①因此,它们也应属于涉海碑刻的范畴。目前,这些元代涉海碑刻大部分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小部分收藏于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泉州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但是,由于上述多为各种宗教信徒的墓碑等,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墓志书写的历史内容显然要丰富得多。本文主要谈论的是3方元代泉州人的墓志,其中两方是近年才被披露的。

第一方:大德三年奉使忽鲁谟斯使者墓志

残存墓志内容:

(前阙)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后阙)



图1 大德三年奉使火鲁没思(忽鲁谟斯)使者墓志(现藏福建博物院)

火鲁没思,又称忽里模子或忽鲁谟斯 Hormuz,是波斯湾的重要贸易港口,伊利汗王朝时期,作为臣属国向蒙古人称臣纳贡。哈赞,即合赞(Ghanzan, 1271-1304),伊利汗国第七代王。

在所有汗国中,伊利汗国和元朝之间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自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以来,双方使臣来往不绝。14世纪初,波斯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使得海路交通得到很大发展,此时伊利汗国的主要海港已由西拉甫和记施移到忽鲁谟斯,而元朝与伊利汗国交往的主要港口是泉州。^②最有名的莫过于1291年马可·波罗等一行人奉命护送蒙古女子阔阔真,从泉州港启航远嫁伊利汗国王室这一历史故事,当年马可·波罗就

^① 主要成果可以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文物出版社,1957年;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5年;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编《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达生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碑铭研究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近百年泉州宗教学回顾暨纪念吴文良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1月,等等。

^② 陈高华《陈高华说元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是从泉州后渚港启航,从忽里模子上岸的。合赞在位期间(1295—1304),多次派遣使者来元朝,而元朝也多次派使臣护送使者回国。例如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派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合赞留在身边服务,后来又派他回元朝奏事。^①大德二年(1298),合赞遣使来元朝,献大珠、宝石、文豹等奇珍异物,成宗厚赐之,使臣驻留4年后才返回伊利汗国,回国前成宗将蒙哥汗时代以来旭烈兀位下历年应得岁赐发给合赞,并遣派官员一人送使者还国。^②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泉州人奉使忽鲁没思。大德八年(1304),又派杨枢护送合赞王使臣那怀回国,也是从忽鲁没思登岸。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年是护送某位使者返回伊利汗国或是其他任务,未见史料记载。但从使臣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和合赞王以七宝货物回赐给朝廷来看,此行意义重大。元代的牌符有金虎符、金符、银符(皆长牌)、海青符、圆符(皆圆牌)及驿券(纸券),是驿站使用的牌符,以示官阶。圆牌的等级以“海青牌”为最高。“海青牌”是“海东青牌”的简称,又称“海青符”、“海青圆符”。牌上刻海东青图样,海东青是鹰的一种,为蒙古人最爱。此种牌符仅限于通报紧急军情,持有者往往有特别的权力。佩戴海青牌还可不经由正站(驿站)而由望云站(专为传递紧急军情而立的驿站),取捷径往返,铺马有缺,可向百姓或旅客征用,粮食及其他必需品也可自由征用。“海青牌”又有金海青、银海青之分,以前者为贵。

这位泉州人完成使命归国,将合赞王特赐的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受到朝廷的赏赐,随后便回到泉州本家居住,于大德八年(1304)去世。此碑作长方形,高25.5厘米、长65.5厘米,为碑铭中的一块,碑文四周刻连续传枝花纹图案。此碑1953年掘获于泉州南校场,现藏福建博物院。

关于此方奉使忽鲁没思使者墓志的主人,吴文良先生和吴幼雄先生认为“很可能不是泉州本地人,他或者是一个色目人,或至少是一个外国人同化于汉人的。因为在元代,民族压迫非常厉害,‘南人’最被贱视,不可能做‘大使’”。^③此说显然不符史实,上述的孙胜夫、尤永贤、杨庭璧等以及下文提及的许静山、杨枢都是“南人”,但他们却屡次奉命出使海外诸国,因此以简单的民族压迫的传统观点判断墓碑主人的民族成分或宗教信仰是欠妥的。而杨钦章先生认为墓主是伊斯兰商人的结论,一样没有足够的理由。^④笔者以为,碑文中的“火鲁没思”至今只在该碑刻中出现过,它更似泉州方言对“忽鲁没思 Hormuz”的发音,而“泉州本家”四个字已经表明墓主系泉州本地人,而非其他。

第二方：亦黑迷失妻子盛柔善墓志

墓志内容：

先姊盛氏,讳柔善,清源人也。祖路分,父进士,夫人居长,第四人,妹二人。次弟师亮,后姊二年而卒。先姊幼能理家,代母氏之劳。及长,好恬淡,不事华丽,能知人疾苦,宗族皆称道焉。事祖母孝,朝夕不离左右,祖母酷爱之。年既笄而择对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②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③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0页。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44页。

④ 杨钦章《元代奉使波斯碑初考》,《文史》1988年总第30辑,第139—143页。

未谐。辛卯年间,有泉府司左丞亦黑迷失分司来泉,闻名而就聘,时年二十四,遂强与为婚。左丞公常语其家人曰:“夫人名族之女,知礼义,吾不可以众人待之。”是以家中无小大,皆称夫人。教子弟皆讲母礼,然夫人不以为喜,每自谓:“齐大非吾偶也。”甲午年夏,产后得风疾,至辛丑秋,病愈剧。易箦际区处,后事了了然,泣谓母曰:“人谁不死,死得其所为幸。今吾得死于父母之邦,幸矣。惜乎父母年尊,二女卑幼,为可恨耳。”先姊生于宋戊辰年十二月十三日子时,卒于大元辛丑七月十三日戌时,享年三十四岁。女二人:长泉奴,年十二;次丑,年十岁。将于癸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南安县招贤里董埔村。丑山未向,居祖考路分矿之右。不敢乞铭于当世君子,姑志岁月而纳诸幽。时大元大德七年太岁癸卯十二月十九日壬寅,弟盛师度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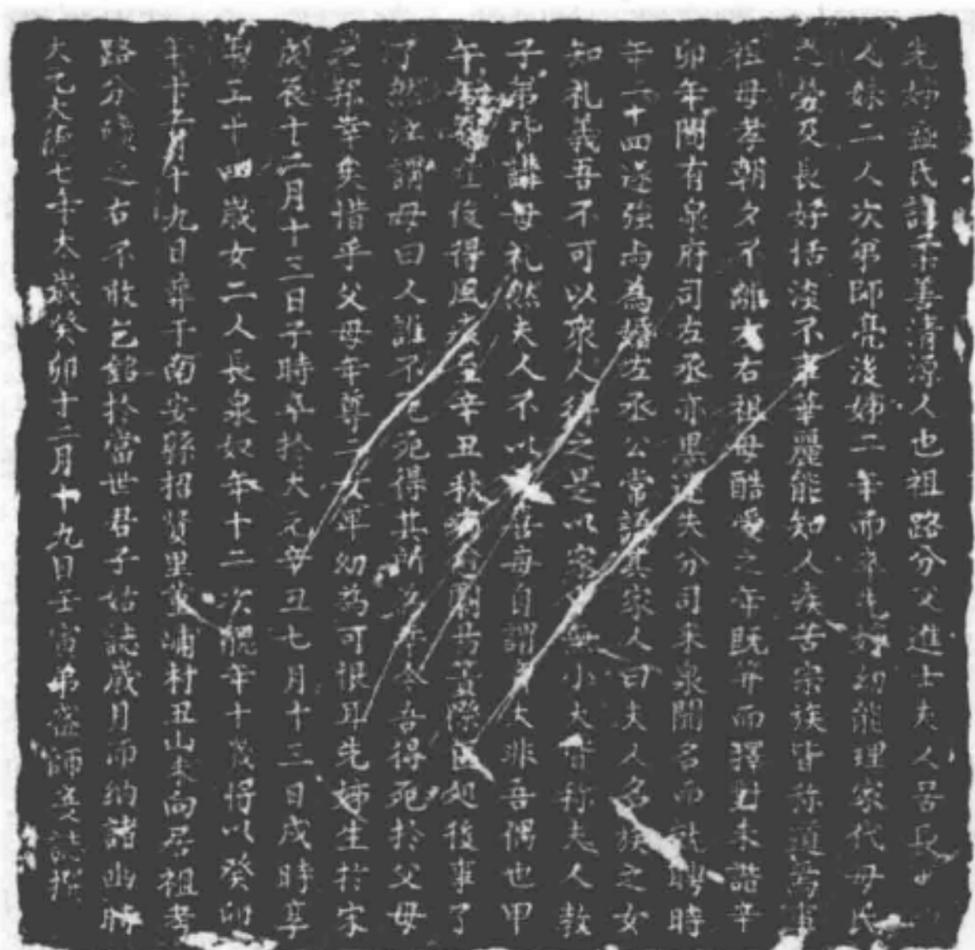


图2 亦黑迷失妻盛柔善墓志(现藏泉州博物馆)

亦黑迷失是元初著名的畏吾儿航海家,在征爪哇之前,就曾4次奉忽必烈之命出使海外,出色完成招徕海外诸国和为忽必烈搜罗奇珍异宝的使命。他为元朝的佛教事业和海外贸易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蒙元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据《元史》亦黑迷失传,亦黑迷失至元九年(1272)奉使八罗孛国(印度西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两年后“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忽必烈赐金虎符;至元十二年(1275),再度出使八罗孛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至元二十一年(1284),奉命出使海外僧伽刺国(今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至元二十四年(1287),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取佛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此次亦黑迷失还用自己的钱特地购买紫檀木殿材敬献给忽必烈,受到皇帝召见,“帝悯其劳,又赐玉带,改资德大夫,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行泉府太卿”。至元三十年(1293),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由后渚港(泉州港)启航远征爪哇,惨败获罪。后以荣禄大夫、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馆

事,告老家居。仁宗在位时(1312—1320),念其屡次出使海外有功,诏封“吴国公”。^①

据此墓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亦黑迷失以“泉府司左丞”的身份来到泉州,同年与墓主盛柔善结婚。然史书从未记载他曾任“泉府司左丞”一职,只是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出使马八儿国回来后(据其传,此次受风涛所阻,行驶一年后才到达目的地,那么回国当在1289年),官阶由至元十八年(1281)的荆湖占城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品)升为资德大夫(正二品),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行泉府太卿。笔者之所以将此碑列入涉海碑铭,在于两个关键词组“泉府司左丞”和“分司来泉”。

“泉府司”是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由斡脱总管府升格更名的朝廷机构,“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②也就是为皇帝及其亲族经营高利贷,和原来的斡脱总管府职责相同。后来又在江淮(江浙)行省分设行泉府司,作为泉府司的派出机构,职掌扩大到管理海运和海外贸易。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市舶司划归泉府司管辖。^③由于管领市舶,各地设置市舶司的沿海港口便相应地设置行泉府司,专掌海运。这样一来,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市舶货物的沿海运输,均在其控制之下,权势非同寻常。亦黑迷失在任江淮行泉府太卿(约1289年)之后,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泉府司左丞”的身份“分司来泉”,实际上等于中央政府派要员直接到一线负责处理整个福建地区(甚至更大行政范围)一切与海外贸易及海运有关的事务,从一个侧面证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亦黑迷失也从此在海外贸易事业上颇有建树,据元史专家陈得芝先生通过对亦黑迷失于延祐三年(1316)所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文背景进行深入解读,又以元贞二年(1296)五月,亦黑迷失再次向元成宗进献紫檀木一事^④为旁证,提出新见解。陈先生认为,他能够向全国的一百座大寺院布施巨资,表明“‘告老家居’后的亦黑迷失,仍参与番夷使客朝贡和官方海外贸易事务”。亦黑迷失“个人能积累如此财富的,当数斡脱商人和掌管斡脱的官员了”。并“推测亦黑迷失担任行泉府太卿期间的常驻地在市舶油水最丰沛的福建泉州”。^⑤盛柔善墓志完全证实了陈先生的解读是正确的。爪哇之役败归后,亦黑迷失获罪告老回家,回的是泉州而非其西北故乡,他与盛氏所育二女分别出生于1292年和1294年。泉州港是最终成就他为“百万富豪”的发家福地。

此方墓志内容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纪录了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同泉州盛氏的一段姻缘,为研究其人其事提供极其难得的生活信息,也为研究元代畏吾儿族群在泉州的社会生活和多种民族相互融合提供十分珍贵的资料,^⑥同时,揭示出泉州港在元朝海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此碑宽29厘米,高29厘米,现收藏在泉州市博物馆。

① 《元史》卷一三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98—3200页。

② 《元史》卷一一《世祖十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27页。

③ 《元史》卷一四《世祖十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92页。

④ 《元史》卷一九《成宗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04页。

⑤ 陈得芝《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背景解读》,《燕京学报》新二十六期,2009年5月,第39—56页。

⑥ 拙文《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与清源盛氏的婚姻——兼释元代泉州盛氏家族三方墓志》,《福建文博》2012年第3期,第40—54页。

第三方：大德八年出使异域兵部侍郎许静山墓志

碑文内容：

先君侍郎许公墓志

先君讳应□，字士元，静山其号也。世居温陵，祖讳永，人匠提举。祖妣李氏，生三男，先君居长。娶董氏武荣朝奉之孙女，生天泽，女佛娘，适张孝先。天泽娶左副翼刘进义之女。孙男二人：观□、妈保，孙女二人：长娘、宝娘。先君壮年识量过人，不露圭角。内省平章吴国公来泉，一见即器其材而荐用之，两擢行省宣使。至元庚寅，调永春簿，政平讼简，民咸德之。大德甲辰，遥授兵部侍郎使于异域，回奉珍宝入贡。□迁官，闻亲讣而归，遂辞闲不仕为终焉。□计卜筑园池，手植花木，适意优游林间，不与世接。每清晨盥漱则持斋诵经，未尝一日辍也，乡民善人称之。寿终七十有二，生于咸淳乙丑十二月戊寅，卒于至元丙子三月己酉。先是手营葬地于南安县招贤里石竹山之原，大父提举公莹侧也。癸山坐丑向未，水归辛庚，虚其左为母寿藏。□死卜以丁丑岁十二月六日壬申奉枢窆焉。不敢丐铭于当世君子，姑书岁月而纳诸幽。孤子许天泽泣血谨志。

武德将军□□泉州路湖州万户府万户钱泰义□□



图3 大德八年出使异域兵部侍郎许静山墓志（现藏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

许静山生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卒于后至元二年(1336),享年72岁。因为父亲许永是“人匠提举”的缘故,许静山有幸遇到亦黑迷失。在亦黑迷失的推荐下,他两度进入行省机构当差,虽是吏员,但行省吏员与高级官员接触机会多,晋升机会也就更多。至元庚寅(1290),许静山由行省吏员出任永春主簿,进入官员行列。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代“官”与“吏”并用,考核也分“秩官”与“吏员”两类,吏员考核“三十月为一考”,三考满任即可量加区用(当然,在具体考核实施过程中,吏员的任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如果从1290年出任永春县主簿倒推算,20岁出头的许静山在1284—1285年就已在亦黑迷失的提携下首先到泉州行省当差(第二次指的应是江西行省或江浙行省宣使)。也就是说,至迟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亦黑迷失已经来到泉州,这一年他出使僧迦刺国(今斯里兰卡),启航和回航的港口显然就在泉州港。同时表明,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东南侧),泉州港同样是他的出进口岸。因为泉州经过宋代两百多年海外贸易的成功经营,同海外诸国已经构筑起庞大的网络,这里还有种类繁多的出口商品,有众多熟悉航路的舵手以及有能力建造适于远航的尖底海船,这些都为开展海外宣传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帮助。况且泉州商人与僧迦刺国和马八儿国素有贸易往来,具备种种优越条件,亦黑迷失选择泉州港作为出使海外的进出港,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从至元庚寅至大德甲辰(1304)遥授兵部侍郎(秩正四品,非实职官衔)之间的14年间,有10多年的时间许静山究竟做了什么,墓志对此无语。元朝的官场讲的是“跟脚”,“一般汉人、特别是南人,能得一官半职者,大都也不过是州县卑秩,要想升到从四品以上的品秩是十分困难的”。^①因此,笔者推测,许静山在任满永春主簿之后的“空白期”里,亦黑迷失让他替自己掌管海外贸易事务(至少是部分的),用官家本钱到海外采购统治者需要的珍稀物品。一方面亦黑迷失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在泉州培植亲信,直接到海外为其出海贸易。另一方面从小在重商意识浓厚的环境里长大的许静山,难免商海的诱惑,同时他也希望以此报答亦黑迷失的知遇之恩。元时高层官员多参与海外贸易,官员成为舶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行省官人、行泉府司官人、市舶司官人,^②“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也纷纷“下番博易”。^③

大德八年,亦黑迷失利用行省平章政事、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会同馆是接待和引见番夷朝贡使者的朝廷机构,还与派遣“使者”到海外采购珍奇异货的事务有关)^④的特殊身份,向朝廷推荐许静山。唯有如此,许静山才有可能平步青云,成为朝廷的使节。否则,完全无法解释一个品秩低微的“南人”官员,仅凭在永春(下县)的政绩,在多年后竟能被朝廷委以重任,一跃拥有正四品官衔、遥授兵部侍郎奉使异域。从这一侧面,可以推测许静山当有多年与海外诸国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许静山墓志的发现,为元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文物资料,是畏吾儿航海家亦

①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

②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之八·市舶则法二十三条》,陈高华等点校,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二册第876页。

③ 《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市舶》,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④ 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150—151页,转引陈得芝《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背景解读》,《燕京学报》新二十六期,第49页。

黑迷失（吴国公）参与海外贸易活动又一极其难得的历史纪录。^①

该碑宽 39 厘米，高 46 厘米，现藏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

三

许静山墓志载：“大德甲辰，遥授兵部侍郎使于异域，回奉珍宝入贡。”

关于许静山大德八年的此次出使，《元史》及地方文献均不见记载，墓志竟又省略“异域”所指，使之成为历史之谜。然而，比诸《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似乎两者有着某种巧合。笔者认为，当年许静山可能是与杨枢一起出使忽鲁模思，共同完成护送合赞亲王使者那怀一行的使命。

兹将《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枢）墓志铭》节录以下：

……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见宸庆殿而退，方议旌擢以酬其劳，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②

杨枢出身浙右望族，海盐世家。其曾祖父杨春，南宋时曾任武经大夫，入元后以子贵，勋赠中宪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祖父杨发，曾任南宋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等，降元后，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等，统管庆元、上海、澈浦三处市舶司，为忽必烈所器重。据《海盐县志》记载，至杨发时，杨家“复筑室招商，世览利权。富至僮奴千指，尽善音乐。饭僧写经建刹，遍二浙三吴”。其父亲杨梓官至嘉义大夫、杭州路总管。^③至元三十年（1293）二月，时任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副使的杨梓，应诏与亦黑迷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并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出海牙、全忠祖、万户张塔刺赤等率领五百余人，乘坐十艘船只，先往招谕。^④正如杨枢墓志开头所云“累世以材武取贵仕，入国朝仕益显最，号巨族”。

杨枢在 19 岁时能从致用院获得官本船，浮海西洋，完全倚赖家族的经济实力以及与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在此次航海经商时，途中与伊利汗国亲王合赞（即哈赞）派出前往大元朝廷的使臣那怀偶然相遇，他便将使臣接到所乘的“官本船”（应是适于航行印度洋

^① 关于这方墓志，笔者曾有专文《大德八年出使异域兵部侍郎许静山墓志考》，刊发在 2013 年《福建文博》第 3 期，第 21—26 页。

^② [元]黄潜《文献集》卷八上《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黄潜全集》下册，王颀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513—514 页。

^③ 关于杨氏家族资料还有：陈旅《安雅堂文集》卷一一《杨国材墓志铭》；《元史》卷九四《市舶》；（光绪）《海盐县志》卷一〇《食货考》、卷一五《人物考·杨发》，台北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本。

^④ 《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三·爪哇》，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 年，第 4665 页。

等海域的尖底船,如福船),从“西洋”(即马八儿国^①)一路指引至京城,此举不仅赢得那怀的信任,显然朝廷也十分赞赏这位初出茅庐、有胆有识的年轻人。于是,当那怀一行完成出使任务,向朝廷提出让杨枢护送回国的请求时,“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如其请,奏授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杨枢在执行此次护送任务过程中,“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事事躬亲。如此看来,杨枢此次出使扮演的更像是“副使”的角色,其墓志所载亦未明确其“正使”的身份。

元朝下海使臣有正使、从使(副使)之分,“经由都省(中书省)分拣正从,行移合属应付”。^②使臣持玺书,佩牌符,犹如皇帝亲行,权力很大,沿途站赤(驿站)必须供给铺马、站船,并征发民夫,担运物资,以抵达下海的港口。使臣杨枢虽年轻有为,具有海外贸易的经验,却从未在政府机构中有过磨练,临行前授其忠显校尉(从六品^③)、海运副千户(从五品^④),只是作为奖掖和外交政治的一种象征。但从两国交好的形式而言,朝廷通常派出的使者一定要拥有较高的官衔,以示对他国的重视和友好。许静山在亦黑迷失的提携下,曾两度充当行省宣使,由吏而仕,担任过永春主簿,之后极有可能直接参与亦黑迷失组织的斡脱贸易或参与泉府司的海外活动,对海上航线和海外诸国有相当了解,因此朝廷才会派遣他出使海外。

大德八年,当杨枢以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从五品)出使忽鲁模思之际,许静山以兵部侍郎(正四品)的身份也出使异域,回国时他们都回奉珍宝入贡。难道是历史的巧合?不知他们是擦肩而过、抑或同甘共苦?笔者疑为,此次朝廷派遣出使伊利汗国、护送合赞使臣那怀一行至忽鲁模思的使臣(正使),不可能是毫无官场政治经验的杨枢,而恰恰是泉州人许静山。值得注意的是,泉州港是元朝与伊利汗国交往的主要港口,从马可·波罗护送蒙古女子和大德三年泉州无名氏出使忽鲁谟斯,可以推测当年杨枢护送那怀也是从泉州港启航出海的。

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离不开大历史的背景,而恰恰由于《元史》的仓促成书、元成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又大部分散失,加之明代修纂的地方志对许多元代史料阙如,给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包括重要事件、人物、社会生活等)造成巨大的困难,单靠文献解读远远不够,因而来自元代的任何墓志资料便显得特别珍贵。一方数百字、哪怕寥寥数十字的墓志,其中都可能隐藏着一段重要的历史。

然而墓志受传统书写规则及篇幅所限,所记往往高度概括,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已经难以了解或理解其中隐含的历史故事,多少纷纷扰扰、多少轰轰烈烈闪烁在片言只语间。墓志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某位先人的事迹,它保存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片段,也留在后人的记忆中,令人遐想。故而,针对墓志简短的历史书写,展开历史时空的想象,给与合乎情理的阐释,应该是可以的。

① 元代“西洋”专指印度南端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非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所泛称的印度洋。元史专家陈高华、陈得芝、刘迎胜等均持此说。

②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站赤四》,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1页。

③ 《元史》卷九一《百官七》,中华书局校点本,2005年,第2322页。

④ 同上书,第2315页。

Existence and Imagination: a History in Quanzhou's Yuan-Dynasty Epigraphs about Maritime Activities

Chen Lihua, Quanzhou Maritime Museum, Fuji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abundant historical data and relics indicate that Quanzhou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trading port in the Yuan Dynas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entry/exit port for foreign envoys. The gravestone of "Ambassador Hormuz" found in 1953 is undoubtedly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relic data cited by all the scholars studying Quanzhou's Yuan-Dynasty history. Decades later, the discovery of another two gravestones, "Epigraph of Sheng Roushan" and "Epigraph of Xu Jingshan", once again provided the precious research resourc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Sheng Roushan and Xu Jingshan had very close relations with Yiheimishi (*Yighmis), the famous Uygur navigator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former is his wife while the latter is an official he gave guidance and help to and promoted. It was in the same year of 1304 (the eighth year of Dade) that Xu Jingshan served as an envoy abroad when Yang Shu escorted envoys from Ilkhanate back to their country.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status of Quanzhou as well as Yiheimishi'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overseas affairs, we can infer from such coincidence that Xu Jingshan and Yang Shu were sent on the same mission.

Key Words: Quanzhou Harbor; epigraph, Hormuz; Yiheimishi; Xu Jingshan; Yang Shu

（本文作者为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从《奉使波斯碑》看元朝同伊利汗国使臣往来

(日本) 四日市康博 撰 (中国) 赵莹波 译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奉使波斯碑》墓主出使伊利汗国的记载进行考证,探讨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政治关系。元朝—伊利汗国同属托雷家族,既使在合赞汗朝伊斯兰化之后,依然不断有来自大汗承认伊利汗即位的敕书、历书、授予食邑、下嫁皇女、赐予宝物,以之维持元朝和伊利汗国间的提携关系。这也是巩固大汗家和旭烈兀家的同盟、承认大汗和诸侯王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行为,而《奉使波斯碑》墓主的出使也应该被看成这其中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奉使波斯碑 元朝 伊利汗国

一、《奉使波斯碑》与周边

《奉使波斯碑》于1953年在泉州的南教场遗迹出土,现收藏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①该碑是装点祭坛墓中央碑丛(塚石碑)中的一个。该碑丛风格与《奉使波斯碑》相类似,除此之外,在祭坛墓中,还有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祭坛式石墓),^②或是中式祭坛墓,^③可分为基督教墓、摩尼教墓、伊斯兰教墓等类型。碑丛竖立在祭坛墓中央,由二三块或五块石碑组成,其内容包括墓碑以及圣典句式、宗教文章等。《奉使波斯碑》长27厘米,宽67厘米,碑文周围装饰着云纹。由于碑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只是整个文章局部,且碑文内容前后连贯,固可断定,该碑文至少由3块以上石碑组成。在泉州曾发现许多形状和风格相类似的石刻,但皆非汉人墓碑。依笔者拙见,这类墓志碑仅限于泉州,为其他城市所罕见。《奉使波斯碑》中的文字为汉语,在泉州城发现的汉语碑丛中,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景教)以及摩尼教的墓碑,不过,由于《奉使波斯碑》中缺乏能确定墓主所信仰宗教的文字,因此难以界定其为何种宗教墓。在泉州,除汉语碑丛,还出土有阿拉伯语和叙利亚文的突厥语碑丛,这些大都在泉州城内外,据认为是在曾是基督教圣堂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地方出土。另外,还有不少是在城门以及砌城墙石头中发现的,^④其中件数最多的为伊斯兰教石碑。既使在发现《奉使波斯碑》的南教场遗址中,也发现有阿拉伯语的伊斯兰碑丛。也有学者认为,《奉使波斯碑》的墓主为伊斯兰商人,如杨钦章在考察《奉使

① 该碑原石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复制品在福建省博物馆,拓本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示。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图版第37页,图100—101;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6页;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44页。

③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44页,图版第49—50页;图149—150。

④ 后者据认为是后来在修复城门和城墙时作为石料被再利用的。

波斯碑》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该碑的内容,经吴文良校订并发表的照片再加上杨钦章对石碑的考证,已十分明确,即便如此,本稿还是在此摘录如下:

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设思(Hormuz)田地勾当。蒙哈赞(Ghazan)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

由此碑文可知,墓主于大德三年携带金字海青牌,经由“火鲁设思”(Hormuz)抵达伊利汗朝宫廷合赞汗(Ghazan Khan)处,后返回元朝,并于大德八年故去。墓主既然携带有金字海青牌,肯定为元朝带有官职的正式使者。因此,这种使者往来,在元朝和伊利汗朝的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稿意在考察这种使者的派遣在元朝和伊利汗朝的外交上具有何种意义。不过,为了能充分理解《奉使波斯碑》在外交上的意义,笔者认为,不能仅限于该碑文,有必要结合考察该事件前后的使节往来。所以,下节拟考察元朝和伊利汗朝之间从世祖忽必烈朝到仁宗朝与旭烈兀朝、苏丹完者都朝的外交。

二、元朝、伊利汗国之间外交和使节交换

元朝始祖忽必烈与伊利汗朝始祖旭烈兀为兄弟,其父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托雷家族夺取蒙古帝国大汗位,由蒙哥可汗即位。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伊朗分别建立了托雷族裔的政权。所以,在蒙古帝国分裂成的四个汗国中,元朝与伊利汗朝一直保持着特别亲密的外交关系。在东方,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在竞争大汗位的继承权时,旭烈兀似乎按约定支持忽必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即位后,立刻向旭烈兀派遣使者并携带敕书(*jarliy*),可谓元朝向伊利汗朝派遣的最初外交使者。在使者带去的敕书中,记载有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即大汗位、承认旭烈兀作为皇帝在伊朗方面的统治权、以及忽必烈向旭烈兀派遣三万骑兵等内容。^①换言之,忽必烈在宣告自己继承蒙古帝国大汗位、就任元朝皇帝的同时,也承认旭烈兀作为伊利汗即伊朗皇帝。此后,无论是旭烈兀之后继承伊利汗位的阿八哈汗,还是阿鲁浑汗,皆是在得到大汗元朝皇帝的认可后才正式即位,并由此形成惯例。^②伊利汗朝的历代货币都刻有“以大汗之名~(伊利汗)铸造”的刻文,^③且一直沿袭到改宗伊斯兰的合赞汗时期之前。由此可见,至少合赞汗以前的伊利汗都是在得到元朝皇帝承认后才即位的。合赞汗以后没有把可汗的权威刻在金币上的

① 《史集》旭烈兀汗纪《史集》*Jāmi' T./Roushan : Rashīd al-Dīn Fadhl-Allāh Hamadānī. Jāmi' al-Tawārīkh*, M. Roushan; M. Musavī [ed.]. *Jāmi' al-Tawārīkh*. Tehrān. 1373/1995 p.1047.

② 同上注。

③ 在从阿八哈到乞合都时代的金币和银币上,都刻有“以大汗之名~铸造”的刻文(但是在旭烈兀时期发行的货币上仅有波斯文没有发现蒙古文)。例如,在阿八哈汗时期的金币上刻有“Qayan-nu ner-ber Abaqa-un deledügülüg_sen, Ariyu”(以大汗之名阿八哈铸造纯(金)(钱币))、银币上刻有“Qayan-nu ner-ber Abaqa-un deledügülüg_sen”(以大汗之名阿八哈铸造纯(钱币))的维吾尔文。之后,直到拜都汗时期,仅替代伊利汗的名字,其他都是相同的名字。参见 Nyamaa, B. 2005. *The Coin of Mongol Empire and Clan Tamgha of Khans (XIII-XIV)*, Ulaanbaatar, pp.107—109, pp.212—223。

现象,^①但大汗的权威并未被否定,而且伊利汗即位后依旧需要得到元朝的认可。

有关元朝与伊利汗朝交换使节的问题,汉文史料、波斯史料以及其他史料均有记载,但零星不成体系。即便如此,当把这些记录汇集在一起时,就会发现,元朝与伊利汗朝间的使节往来存在一定法则。例如,历代伊利汗一旦即位,就会向元朝派遣使者通报新伊利汗产生,而元朝方面也会派遣使节携敕书予以承认。在围绕伊利汗即位的交往中,既有来自伊利汗朝方面对元朝权力的承认和承诺,又有来自元朝方面授予的王号、印章、历书以及下赐品,甚至还伴随有皇女的下嫁,不过,这种交往并非仅限于一次使节交换,而需历经数次使节的互派来实现。

例如,在苏丹完者都时代,元朝曾数次向伊利汗朝派遣使者。元朝最初向完者都朝廷派遣使者正值元朝、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和术赤汗国四大汗国间达成历史和议时期。当时成宗铁穆耳可汗向合赞汗派遣使节,^②但当这位使者于1304年抵达伊利汗宫廷时合赞汗已去世,由苏丹完者都即位。^③据说完者都立刻向元朝派遣使者通报新伊利汗即位,但尚不清楚元朝是否又派遣使者对完者都的即位予以承认。据认为,完者都于回历703年派遣使节通报其即位,但在第二年的大德八年(回历704年/公元1304年)正月成宗驾崩,^④而派往伊利汗朝通知完者都成宗驾崩的使者于一年后才到达。^⑤因此,新伊利汗即位的通告并非递交到成宗铁穆耳那里,很可能是随后即位的武宗海山可汗手中。武宗于至大元年(回历707—08/公元1308)向伊利汗朝派遣了以脱里不花(Toguril Buqa)为首的二十人使节团,^⑥这个使节团应同时兼有通告武宗即位以及承认完者都即位的双重使命。武宗政权短命而终,至大四年三月(回历710/公元1311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即位。毫无疑问,仁宗肯定会向完者都派遣使者告之新大汗即位,但依笔者愚见,目前还无法确认有这方面的纪录。能确认的是,皇庆二年(回历712—13/公元1313年)元朝

① 在合赞汗的金币和银币上已没有“以大汗之名”的宣言,取而代之的是“借长生天之力”的宣言。“Tengri-yin kücün-dür Qasan-u deledügülug_sen”(借长生天之力,合赞汗铸造(钱币))。参照 Nyamaa 2005, pp.110-111, pp.223-245。由此可见,合赞汗之后的伊利汗朝消除了中国和蒙古的影响,加强了对伊斯兰文化的依赖,之前的研究也有相同的观点(例如,参照 Kolbas, Judith 2006. *The Mongol in Iran: Chingiz Khan to Uljaytu 1220-130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93-295)。但是,如果从印章和敕书的观点来看,合赞汗之后依然继续使用汉字印章、蒙古文文书,与元朝的外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必须从多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② 《完者都史》T.Üljäytü/Hamblī: Abū al-Qāshim ‘Abd-Allāh bn Muḥammad al-Qāshānī. *Tārīkh-i Üljäytü*, Mohīn Hamblī [ed.]. Tehrān, 1348. 回历704年纪 pp.31-32;《瓦萨夫史》卷四;《瓦萨夫史》卷四 T.Waṣṣāf/Bombay: Shihāb al-Dīn ‘Abd-Allāh Sharaf Shīrāzī. *Tajziyat al-Amṣār wa Tajziyat al-A‘sār (Tārīkh-i Waṣṣāf)*, *Tārīkh-i Waṣṣāf al-Ḥaḍrah dar Aḥwāl-i Salāṭīn-i Mughūl*. Tehrān. 1338/1960 (rep. of Bombay ed.p.475.)

③ 《完者都史》王子完者都的诞生记(Tārīkh-i Üljäytü/Hambly, pp.23-24.);《瓦萨夫史》卷四 T.Waṣṣāf/Bombay: Shihāb al-Dīn ‘Abd-Allāh Sharaf Shīrāzī. *Tajziyat al-Amṣār wa Tajziyat al-A‘sār (Tārīkh-i Waṣṣāf)*, *Tārīkh-i Waṣṣāf al-Ḥaḍrah dar Aḥwāl-i Salāṭīn-i Mughūl*. Tehrān. 1338/1960 (rep. of Bombay ed.p.468-469.)

④ 《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癸酉,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⑤ 《完者都史》T.Üljäytü/Hamblī: Abū al-Qāshim ‘Abd-Allāh bn Muḥammad al-Qāshānī. *Tārīkh-i Üljäytü*, Mohīn Hamblī [ed.]. Tehrān, 1348. pp.40.

⑥ 《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至大元年秋七月癸酉,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曾经派遣拜住作为使节向伊利汗朝孛罗丞相(Bolad Aqa)授予金印,^①回历714年(延佑元、二年/公元1314—1315年)下嫁哈敦作为完者都妃子的纪录。^②

伊利汗朝、元朝双方都是在皇帝交替之际多次互派使者,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元朝不仅只限于对伊利汗,而是对其重臣也会授予官职、爵位、印章。中国史料记载有,皇庆二年元朝向孛罗授予金印,^③泰定元年向出班(Čoban)授予“翊国公”及银印等事例。^④在其他史料中也发现元朝对阿鲁浑期的阿米儿不哈授予“丞相”位和朱印的记载,当然这些都必须得到伊利汗朝认可。^⑤另外,元朝还分别授予乞合都时期财务长官(Sāhib-i Dīwān)阿合马、完者都时期担当瓦即儿(wazīr/首相)的撒都丁(Sa‘d al-Dīn)“行户部尚书”和“王府之印”。^⑥究其原因,由于“行户部尚书”和“王府”均不属于元朝中央的官印,而是镇守地方诸王行政机构的“王府”和地方官府“行户部”的官印,这充分反映出元朝只是把伊利汗朝作为其领内中的一位诸王来看待的意图。^⑦因此,忽必烈尽管承认旭烈兀拥有伊朗的皇帝权利,但此后,元朝一方为皇帝,而伊利汗不过是王族一员的现状则依然保持未变。对此,伊利汗方面一边在形式上承认元朝皇帝的权威,一边通过与中国贸易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借用元朝皇帝的权威(例如,使用汉字皇帝宝玺、黄金牌子(paizah)支配伊朗来获取实际利益。

三、《奉使波斯碑》再考

如上所述,在元朝与伊利汗朝的外交关系中,将如何摆放本稿《奉使波斯碑》中所提到的派遣使节的位置?首先,碑文中虽有“大元进贡宝货”字样,但是指别国向元朝进贡宝物,并非意味着元朝向他国所进贡,或许是指伊利汗或者其他国家向元朝进贡的事实。墓主恰逢此次进贡之际“蒙圣恩赐赉”,所以,墓主也有可能原本是他国使者但后来归属于元朝的一位人物。据墓碑所记,墓主于大德三年(回历698—699/公元1299年)被派往“火鲁设思(Hormuz)田地”即伊利汗朝,并获合赞汗赐七宝货物而回朝。在《元史·成宗本纪》大德八年七月(回历704/公元1304年)条中,载有“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來贡珍物”等有关合赞汗遣使贡物的记录。^⑧这与《奉使波斯碑》墓主返回元朝年代比较接近。如果《元史》中这个使节与《奉使波斯碑》墓主为同一人的话,那么墓主在回国

① 《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珠元帅出使事实》,元刊本影印(四部丛刊初集)。

② 《完者都史》回历716年(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5.)

③ 《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至大四年六月己未,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④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泰定元年十一月癸巳:“诸王不赛因(Abu Said)言其臣出班(Coban)有功请官之,以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⑤ 《瓦萨夫史》卷二(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229.)

⑥ “行户部尚书印”的印影能在回历692年(公元1292年)财政厅长官阿合马传令文书(弗瑞尔艺廊所藏)以及回历692年财政厅长官阿合马传令文书(伊朗国立博物馆藏阿尔达比勒文书,r.466/s.25885)上印证;“王府之印”的印影在回历704年(公元1304年)宰相撒都丁的传令文书(伊朗国立博物馆藏阿尔达比勒文书,r.442/s.25862)上得到佐证。

⑦ 参见 Yokkaichi Yasuhiro 2015. “Four Seals in 'Phags-pa and Arabic Scripts on Amīr Čoban's Decree of 726 AH/1326 CE.” *Orient* 50. Special Issue: Multilingual Documents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in Mongol-Ruled Iran. (in Print)

⑧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八年七月癸亥,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后,将会在二到四个月之间去世。墓主是在泉州去世的,年内从大都到泉州大约要花费二三个月,所以使节七月抵达大都,同年内再到泉州,这在时间上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元史·成宗纪》中大德八年七月合赞汗的使者与《奉使波斯碑》墓主返回中国这点来看有可能是同一位使者。

吴文良对《奉使波斯碑》考证后,否认墓主为基督教徒,指出墓主非汉人,有可能是色目人或者汉化了的外国人。^①另一方面,杨钦章指出有可能是刘敏中撰写的《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所出现的不阿里(Abū Kharī)。^②墓主非汉人这点即使从墓碑的形态上判断也不会出错。

对杨钦章指出墓主是不阿里这一点,桑原隲藏提出了合赞汗向元朝派遣的怯失(Kīsh)王札马儿丁(Jamāl al-Dīn Ibrahīm)的儿子法合鲁丁·阿合马(Fakhr al-Dīn Aḥmad)会不会是不阿里的见解。^③法合鲁丁是支配怯失王国 Ṣawāmilī 家的领主,理所应当出身在怯失岛。但据《不阿里神道碑》记载,不阿里是哈刺合底(Qalhāt)出身的商人。哈刺合底原是忽鲁模思(Hormuz)王家的出身地,是当时女王 Bībī Maryam 的故乡,因此,不阿里为忽鲁模思系商人的可能性比较高。在阿曼国的哈刺合底现在还残留着蒙古时代神庙的遗迹。其周边都市的遗迹辽阔,布满了元代的陶瓷碎片。^④换言之,哈刺合底为忽鲁模思系商人航海印度洋时停靠的重要港口,是与怯失王国竞争的忽鲁模思王国的中国贸易据点。所以,哈刺合底出身的不阿里与法合鲁丁很明显不是同一人。^⑤吴文良和杨钦章都指出法合鲁丁不是《奉使波斯碑》的墓主,法合鲁丁在大德元年至二年(回历 697 年,公元 1297—98 年),被伊利汗朝派遣,于大德五年来到中国,大德八年离开中国,回历 704 年在抵达印度的马八儿之前去世。^⑥因此,很明显法合鲁丁不可能是大德八年在泉州去世的《奉使波斯碑》墓主。

那么,关于杨钦章认定《奉使波斯碑》墓主为不阿里的这一见解也显得太过牵强。不阿里身为外国人作为马八儿(Ma'bar / 潘底亚 Pandiyah)国的首相,至元二十八年返回元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1957年,第60页;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2005年,第643—644页。

② 杨钦章《元代奉使波斯碑初考》,《文史》30,1988年,第139—143页。

③ 桑原隲藏《蒲壽庚の事蹟》,岩波書店,1935年,第123—125页。

④ 笔者2013年秋在阿曼国曾现场调查过哈刺合底都市的遗迹和 Bībī Maryam 圣庙址,2014年冬在伊朗的靠近忽鲁模思岛实地调查过 Bībī Maryam 圣庙址。无论哪一个圣庙都保留有蒙古时期的样式,外观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有关阿曼国圣庙的概要也可参见 Costa, Paolo M. 2001. *Historic Mosques and Shrines of Oman*. Oxford: Hadrian Press, pp.176—182。

⑤ 当时马八儿国的首相是由法合鲁丁父亲怯失王札马鲁丁(Jamāl al-Dīn Ibrahīm al-Ṭībī)的弟弟塔喜丁(Taqī al-Dīn 'Abd al-Raḥmān al-Ṭībī)担任,管辖着伊朗与印度间的贸易,尤其是经营着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到印度的马匹的进口业务(《瓦萨夫史》卷三(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302)。并且,马八儿国作为把中国贸易品带到伊斯兰诸国的怯失商人中转地而繁荣[《瓦萨夫史》卷三(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301—303);《完者都史》回历715年(Tārīkh-i Ūljāyṭū/Hambly, pp.182—183)]。在蒙古帝国时期,怯失商人与忽鲁模思商人这两大势力在印度洋上相互竞争,相互支配。马八儿王(潘底亚国王)不断任命怯失王国和忽鲁模思王国这两大系统的商人作为首相。

⑥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静嘉堂文库所藏元至正刻本;《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5—507。)

朝,在大德三年不久病死。^①另一方面,《奉使波斯碑》墓主于大德三年从元朝出使伊利汗朝,大德八年回国。不阿里病死是在墓主出使的大德三年,墓主去世是在大德八年。另外,《奉使波斯碑》墓主是在泉州去世的,所以与在大都去世的阿不里的记载有差异,因此杨钦章关于《奉使波斯碑》上“大德八年”乃“大德三年”之误的说法也无法成立。所以,《奉使波斯碑》的墓主明显和不阿里不是同一人。甚至,也有人指出,怯失(Kīsh)商人塔喜丁也是以马八儿为据点从事与中国贸易有关的人,他是否就是大德元年(回历696年/公元1297)从元朝受赐二珠虎符的那个马八儿国的“塔喜”。^②这个提法虽能自圆其说,但是,由于塔喜丁于回历702年(大德六一七年/公元1302—1303年)在马八儿国去世,^③因此他也不是《奉使波斯碑》的墓主。

在《奉使波斯碑》中,元朝使者赴伊利汗朝时所携带的“金字海青牌面”令人关注。“海青牌”与通常使用的虎头牌、金牌、银牌不同,是授予紧急特使用的牌子。如果是其他使臣,像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公元1290)授予出使阿鲁浑的马可波罗金牌、^④大德八年(1304)授予出使合赞汗的杨枢金牌(金符)、^⑤以及皇庆二年(回历712—13/公元1313年)授予出使完者都拜住虎头金牌,^⑥皆非海青牌。那么,为什么《奉使波斯碑》的墓主会被授予海青牌呢?

由碑文可知,墓主于大德八年(1304)在泉州去世,因此,墓主即使最长也只能用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往来于中国和伊朗。而且,当我们将这一时期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加以研究后发现,在1294—1295年,元朝的成宗铁木耳可汗,伊利汗朝的拜都、合赞相继即位。元贞二年(回历695/公元1296),成宗铁木耳派遣的使臣拜住,^⑦大概是通告伊利汗成宗即位的使者。如果把《奉使波斯碑》中的出使日期考虑进去的话,墓主应该是在元朝收到合赞汗即位的通告后,向伊利汗朝派遣的携带有元朝皇帝敕书的使者。

已确认元朝曾向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派出过承认伊利汗位的使节,但是,所有这种通告或承认即位的使者,都希望比通常的使者更快更早一点抵达伊利汗朝。换言之,那些传递元朝皇帝、伊利汗驾崩或即位的派遣使节作为特使需要携带海青牌,由于《奉使波斯碑》墓主也是作为通告元朝承认合赞汗即位的紧急特使,所以携带了海青

① 《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四《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关于该碑的研究可参照,桑原隲藏《蒲壽庚の事蹟》,1935;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刘迎胜《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海路与陆路》,第20—31页。(原载《历史地理》7,1990年。)

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元年七月甲申:“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1年。

③ 《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5.)

④ 被乞合都汗授与牌子(paizah)为海青牌2、虎头牌1、金牌1。

⑤ 《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Gargasun Darqan)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

⑥ 《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皇庆二年,仁宗以金印赐丞相孛罗(Bolad),且俾往哈儿班答(Kharbandah)王所议事。至中途遇也先不花(Esen Buqa)王,疑有间谍,执以问答。…遂夺其虎符及丞相金印,拘囚王所。”袁楠《清容居士集》,元刊本影印(四部丛刊初集)。

⑦ 《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元刊本影印(四部丛刊初集)

牌。^①

像这样,元朝与伊利汗之间盛行使节往来,尤其是在大汗以及伊利汗交替时会派遣紧急特使来告知、承认其即位。可以认为《奉使波斯碑》墓主即为这种个人使节。另一方面,也有向伊利汗赐物、赐婚或伊利汗向大汗朝贡、接受采邑的使节。这种使节有马可波罗、法合鲁丁和杨枢等。元朝与伊利汗这种亲密关系至少持续到仁宗时期。在《瓦萨夫史》、《完者都史》等伊朗方面的编年史料中,保留有比较详细的从世祖到仁宗这方面的记录,而这些由元朝赴伊朗的使臣就成为情报信息的来源。

结 论

《奉使波斯碑》的墓主既非怯失王家曾经出使元朝的法合鲁,也非同样为怯失王家出身的担任过马八儿国宰相的塔喜丁,更非哈喇合底/忽鲁模思系商人出身同在马八儿国担任过宰相的不阿里,很明显应另有其人。虽然不能确定他的名字,但在发现墓碑的泉州城内的南教场遗址还发现了其他伊斯兰教的碑丛。^②由于出使地点为合赞汗宫廷,所以墓主是伊斯兰教徒的可能性比较高。比起墓主的姓名,研究侧重点更应该放在派往伊利汗朝的使者到底是怎样的人。在蒙古帝国或元朝有很多色目人、汉人使臣随蒙古、突厥系的阿米尔一起担任使节长这样的例子,因此,除墓主之外也有蒙古或突厥重臣作为使节同行的可能性。^③如果这样的话,出使就不仅是单纯的商业任务,即使肩负着元朝—伊利汗朝间重要的政治使命也不足为奇。《奉书波斯碑》中的伊利汗国使节,被授予海青牌,而且使节是在拜都汗、合赞即位不久被派遣的,所以,应该是祝贺拜都或者合赞即位使节的可能性很高。

合赞汗和其弟弟下一任伊利汗完者都,把伊利汗国的国教改为伊斯兰教,还亲自改宗皈依,并以此而著名。之后,伊利汗朝在政治、社会制度不断伊斯兰化的同时,虽说游牧蒙古的要素逐渐淡薄,但只要研究一下他们与元朝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的确,在合赞、完者都以后,伊利汗国的货币上看不到大汗的影响,相反伊斯兰要素在增加。在完者都朝,元朝官职印被授予的最多,另外,还有大量元朝对伊利汗朝重臣授予“国公”爵位的事例。完者都和丕塞因时期,使节往来的记录已经超过合赞汗时期。在此背景下,完者都即位后,元朝、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朮赤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海都(Qaydu)汗国]五汗国之间达成了和议,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彼此互相利用的交通网络。该和议后

^① 但是,虽说是紧急特使也并非在短时间就能往返。《奉使波斯碑》墓主来往于中国和伊朗由大德三年至大德八年花费了五年时间,而阿八哈汗即位之际,于回历663年向元朝派遣的使节直到669年历经六年才从元朝回来(《史集》阿八哈汗纪(Jāmi'/Roushan, pp.1059-1060, pp.1097)。另外,成宗派遣杨枢作为返礼使节出使伊朗时,大德十年出发,至大二年才返回,往返需要四年(《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由此可知,中国至伊朗往返通常需要四到五年左右。而杨枢虽然不是紧急特使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往返,是因为他是海商精通熟悉海上交通的原因。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1957年,第14—17页,第39—42页;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2005年,第38—41页,第117—204页,第216—219页,第229—245页。

^③ 吴文良和杨钦章强调由于南人在元朝受到轻视,所以不会任命为正使。但是,也有像在《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所见的杨枢那样被提拔为出使伊利汗国的使臣。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也有除了杨枢以外蒙古、突厥系重臣随行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在《奉使波斯碑》中也存在。

来破裂,元朝派遣的许多使者被察合台汗国的也先不花抓起来。事实上,合赞汗之后,元朝的势力常常直接介入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朮赤汗国之间的抗争,伊利汗国方面出现了政治上利用大汗威严的动向。伊利汗朝的重臣孛罗、出班向元朝请求“国公”的爵位,以及完者都朝大阿米儿的前四位都拥有中国式朱印就是这种动向的反映。^①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合赞汗时期正处于元朝—伊利汗国政治关系的转换时期。元朝常常在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朮赤汗国的对立中站在支持伊利汗国的立场上。这其中当然有他们同是托雷家族的背景原因,而实际上,在合赞汗朝伊斯兰化了之后,依然不断有来自大汗承认伊利汗即位的敕书、历书、授予食邑、下嫁皇女、赐予宝物,可谓是在维持元朝和伊利汗国间的提携关系。这是维持大汗家和旭烈兀家的同盟,承认大汗和诸侯王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行为。而《奉使波斯碑》中所看到遣使也应该被看成其中的一环。

元朝—伊利汗国 使节派遣一览

A1.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旭烈兀汗

使节: 不明

目的: 通告忽必烈战胜阿理不哥并继承汗位,承认旭烈兀对伊朗的支配权,通报旭烈兀向其派遣援军 3 万骑兵

出发:

到达: 回历 662 年

典据:《史集》旭烈兀汗纪 (Jāmi‘/Roushan, pp.1047)

备考:

回历 663 年(公元 1265 年)阿八哈汗即位

B1. 阿八哈汗遣使世祖忽必烈可汗

使节: 不明

目的: 通告阿八哈汗即位

出发: 回历 663 年(?)

到达: 不明

典据:《史集》阿八哈汗纪 (Jāmi‘/Roushan, pp.1059-1060)

备考:

A2.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八哈汗

使节: Tokachak

目的: 不明

出发: 不明

到达: 回历 668 年赖买丹月(公元 1270 年)

^① 第一位 忽都鲁沙(Qutlugh Shah)的“右枢密使之印”、第二位 出班(Choban)阿拉伯语方形朱印、第三位孛罗(Bolad Aqa)的“枢密副使之印”、第四位 忽赛因(Husayn)的“隐院总管之印”。从第一位、第三位的印文可推断出第二位 Choban 也有“左枢密使之印”的可能性。

典据:《史集》阿八哈汗纪 (Jāmi'/Roushan, pp.1078-1079)

备考: 被 Baraq 逮捕, 但又逃亡至伊利汗廷

A3.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八哈汗

使节: 不明

目的: 授予敕书和王冠, 承认阿八哈即伊利汗位。

出发: 不明

到达: 回历 669 年赖比尔敖外鲁月 (公元 1270 年)

典据:《史集》阿八哈汗纪 (Jāmi'/Roushan, pp.1097)

备考: 同年第二次即位

A4.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八哈汗 (阿鲁浑汗)

使节: 孛罗 (Bolad Aqa)、爱薛 ('Isa Kelemechi)

目的: 不明

出发: 至元癸未 / 二十年 (回历 681—682 年 / 公元 1283 年) (拂林忠献王神道碑)

到达: 于回历 684 年 (?) 抵达 Arran 的 Mansuriyah 宫殿。(《史集》阿鲁浑汗纪)

典据:《程雪楼文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史集》

阿鲁浑汗纪 (Jāmi'/Roushan, pp.1161)

备考: 阿鲁浑于回历 683 年 (至元二十一年 / 公元 1284 年) 第一次即位。使者在此不久后抵达。

回历 683 年 (公元 1284) 阿鲁浑汗即位

A5.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鲁浑汗

使节: 斡鲁朶海牙 (Amīr Ordu-qiya)

目的: 承认阿鲁浑汗即位、授予阿米儿不花丞相 (*chengshang*) 称号

出发: 不明 (回历 683 年 / 公元 1284—1285 年以后)

到达: 回历 684 年都尔黑哲月 (公元 1286 年) (《史集》)

典据: 携带承认阿鲁浑汗即位的敕书, 回历 685 年阿鲁浑汗第二次即位

B2. 阿鲁浑汗遣使世祖忽必烈可汗

使节: Qulutai (兀鲁斛), Abishqa (阿必失呵), Khwajah (火者)

目的: 向不鲁罕妃同族的女子求婚

出发: 不明 [大约在大不鲁罕哈敦死后不久, 回历 685 年色法尔月 (公元 1286 年) 以后]

到达:

典据: 赵世延、虞集等《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 嘉靖四十一年重修《永乐大典》副本, 东洋文库所藏;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マルコ = ポーロ『世界の記述』) F 本) (Marco/F/Benedetto, pp.11-13; Marco/R/Einaudi, pp.86-89)

备考:

A6.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鲁浑汗(中止)

使节:阿鲁浑的使臣寄住马

目的:赴阿鲁浑处求婚

出发: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

到达:(中止)

典据:赵世延、虞集等《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 Marco/F/Benedetto, pp.11-13; Marco/R/Einaudi, pp.86-89.

备考:至元二十七年与答礼使节回合

A7. 世祖忽必烈可汗遣使阿鲁浑汗(乞合都汗/合赞汗)

使节: Nicoro, Maffio, Marco Polo(马可波罗)、Qulutai(兀鲁觶)、Abishqa(阿必失呵)、Khwajah(火者)以及遣返的160名教友。

目的:向阿鲁浑汗下嫁阔阔真公主并向罗马主教递交书信。

出发:至元二十八年初(公元1291年)

到达:

典据:赵世延、虞集等《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 Marco/F/Benedetto, pp.11-13; Marco/R/Einaudi, pp.86-89.

备考:由于阿鲁浑汗去世,阔阔真公主经由乞合都汗至合赞处。马可波罗也经由伊利汗王朝出使罗马天主教会。

回历690年(公元1291年)乞合都汗即位

至元三十一年(回历693年/公元1294年)成宗铁穆耳可汗即位

回历694年(公元1295年)拜都汗即位

回历694年(公元1295年)合赞汗即位

A8.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乞合都汗?(合赞汗)

使节:拜住

目的:不明(通告成宗即位?)

出发:(回历695—696年/公元1296年)

到达:不明

典据:《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珠元帅出使事实》

备考:

A9.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乞合都汗(合赞汗)

使节:不明

目的:不明(承认合赞汗即位?)

出发:大德三年(回历698—699年/公元1299年)

到达：不明

典据：《奉使波斯碑》

备考：使臣携带金字海青牌面

B3. 合赞汗遣使成宗铁穆耳可汗

使节：那怀 (Amīr Noqai), 法哈鲁丁 (Fakhr al-Dīn Aḥmad al-Tībī)

目的：接受旭烈兀家的食邑, 对中国开展贸易

出发：回历 697 年 (公元 1297—1298 年 / 大德元年、二年) (《瓦萨夫史》)

到达：大德五年 (回历 700—701 年 / 公元 1301 年) (?) (杨君墓志铭)

典据：《瓦萨夫史》卷四 (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5-506);

黄晋《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

备考：大德五年 (公元 1301 年) 杨枢一行抵达大都

B4. 合赞汗遣使成宗铁穆耳可汗

使节：不明

目的：护送成宗铁穆耳派遣的使节 (A9)

出发：不明 (大德三年以后)

到达：不明 [大德八年 (回历 703—704 年 / 公元 1304 年) 以前]

典据：《奉使波斯碑》

备考：护送后使臣于大德八年在泉州去世

B4'. 合赞汗遣使成宗铁穆耳可汗

使节：不明

目的：进贡珍品

出发：不明

到达：大德八年七月癸亥 (回历 704 年 / 公元 1304 年)

典据：《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四》大德八年七月癸亥,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1 年。

备考：和 B4 是否同一位使者?

A10.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合赞汗 (完者都)

使节：Tamachi, Torchiyan, Mustafa Khwajah

目的：通告赞同笃哇呼吁和平的和约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 704 年色法尔月 (大德八、九年 / 公元 1304—1305 年)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04 年纪 (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31-32)

备考：与察八儿、笃哇的使节团同行, 在完者都即位后到达

A10'.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合赞汗 (完者都)

使节：不明

目的：通告赞同笃哇呼吁和平的和约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 705 年（大德九一十一年 / 公元 1305—1306 年）

典据：《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455, 475.）

备考：与察八儿、笃哇的使节团同行。在完者都即位后到达。同 A10 是同一批？

A11.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合赞汗（完者都）

使节：杨枢

目的：送旭烈兀家食邑、对伊朗开展贸易

出发：大德八年（回历 703—704 年 / 公元 1304 年）

到达：大德十年（回历 705—706 年 / 公元 1306 年）

典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6-507.）

备考：B3 的使节返回。至大二年（回历 708—709 年 / 公元 1309 年）返回

A11'. 成宗铁穆耳可汗遣使合赞汗（完者都）

使节：不明

目的：带来海东青（*sonqur*）和珍宝（*tansūq*）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 705 年舍尔邦月（大德九一十年 / 公元 1305—1306 年）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05 年（*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49.）

备考：与 A11 为同一使节？

回历 703 年（公元 1304 年）完者都即位

B6. 完者都遣使成宗铁穆耳可汗

使节：亦黑迷失（*Yighmish*）*（和元朝亦黑迷失为不同的人）

目的：通报完者都即位，并对成宗铁穆耳可汗派遣的使节（A10）回应和回礼

出发：回历 703 年（大德八年 / 公元 1304 年）(?)

到达：不明

典据：《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476-477）

备考：完者都即位立刻出发。

A12. 元朝遣使完者都

使节：不明

目的：传达成宗铁穆耳汗去世消息的急使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 704 年 / 蛇年一月（公元 1305 年）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04 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40-41.）

备考：在《完者都史》中记载了成宗铁穆耳汗于回历 704 年去世，忽里勒台大会两度召开，以及窝阔台家的领主察八儿的废位等内容，但是实际上回历 704 年（大德七一八年）成宗铁穆耳汗还没有去世。回历 704 年之后发生的事大概误记在回历 704 年的记事中了。

回历 706 年（公元 1307 年）武宗海山即位

A13. 武宗海山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脱里不花（Toguril Buqa）等二十人

目的：不明（告知武宗即位？）

出发：至大元年七月癸酉（回历 708 年 / 公元 1308 年）

到达：不明

典据：《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至大元年秋七月癸酉。

备考：

B7. 完者都遣使成宗铁穆耳可汗（武宗海山可汗）

使节：不明

目的：护送成宗铁穆耳的派遣使节（A11）

出发：不明

到达：至大二年（公元 1308 年）

典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

备考：与元朝使臣杨枢回朝时同行

回历 708 年（公元 1311 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即位

A14.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阿牙赤（Ayachi）丞相、倒刺沙（Daulat Shāh）Ilchi 以及六百骑兵

目的：通报仁宗即位。

出发：回历 710 年（至大四年 / 公元 1311 年）

到达：回历 711 年赖买丹月（皇庆元年 / 公元 1312 年）抵达身在巴格达的伊利汗的身边

典据：《Tārīkh-i Wassāf》

备考：《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4）

A15.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拜住

目的：授予孛罗“泽国公”爵位和金印。

出发：至大四年（回历 710—711 年 / 公元 1311 年） / 皇庆二年（回历 712—713 年 / 公元 1313 年）

到达：未到

典据:《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至大四年六月己未;《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等记载拜珠元帅出使的事实

备考:据《元史》记载,于至大四年授予孛罗“泽国公”。据《拜珠元帅出使事实》记载,于皇庆二年授予金印。使节团被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扣留

B8. 完者都遣使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

使节:阿必失呵(Abishqa)

目的:前来向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奉送书简

出发:回历713年(公元1313—1314年/皇庆二年—延佑元年)以前

到达:不明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716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3.)

备考:

A16.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阿必失呵

目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给完者都的回书。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713年(公元1313—1314年/皇庆二年—延佑元年)以前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716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3.)

备考:

B9. 完者都遣使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

使节:不明

目的:护送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派遣使(A14),接受旭烈兀家的食邑。

出发:回历711年以后

到达:不明

典据:《瓦萨夫史》卷四(Tārīkh-i Waṣṣāf/Bombay, pp.504)

备考:与阿牙赤丞相、倒刺沙同行出使元朝

A17.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图帖睦尔(Toq Temur)丞相

目的:迎娶后妃

出发:

到达:回历713年(公元1313—1314年/皇庆二年—延佑元年)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716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4-205.)

备考:使臣图帖睦尔被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在大宛(费尔干纳)投入监狱

A18.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不明

目的：给完者都带来中国的珍奇财宝

出发：

到达：回历 713 年（公元 1313—1314 年 / 皇庆二年—延佑元年）以后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16 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5.）

备考：被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掠夺

A19.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遣使完者都

使节：Bolan Hichang 和 80 多人那可儿

目的：

出发：不明

到达：回历 716 年（公元 1316—1317 年 / 延佑三年—四年）以前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16 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8.）

备考：

B10. 完者都遣使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

使节：Bolan Hichang 和 80 余人那可儿（*nökür* 伴当）

目的：为向元朝回礼输送进呈品

出发：回历 716 年（公元 1316—1317 年 / 延佑三年—四年）

到达：

典据：《完者都史》回历 716 年纪（*Tārīkh-i Ūljāytū/Hambly*, pp.208.）

备考：在突厥斯坦被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掠夺

回历 716 年（公元 1316—1317 年）不赛因（Abu Said）即位（以下略）

（本文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文化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从《王公祠堂碑》来看王积翁使日问题^{*}

于磊

提 要: 在忽必烈两次征日本失败并积极准备第三次征讨之际,福建人王积翁被派遣出使日本。关于由他出使的原由,一方面是因他滞留大都期间官途不顺,渴求建功并积极融入到新朝的心态,另一方面忽必烈也看重他于四明、杭州、福州各地任职期间所获取的日本情报以及归降元朝的积极态度。而关于他出使的经过,向来为史家所忽视的《珊瑚木难》所载王积翁滞留合浦时的诗作亦可丰富其航行的过程。最后关于王积翁降元及使日的后世评价问题,当时的知识人多数还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而至明清时期,随着性理观念的强化以及明代“北虏南倭”外部环境变化,知识人的态度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道德批判。

关键词: 《王公祠堂碑》 王积翁 使日 降臣

王积翁(1229—1284),字良存,自号存耕,福建福宁县(今福建霞浦)人。其家族为地方官宦、科举世家。宋末累官至宝章阁学士、福建路制置使。至元十三年(1276),临安被元朝接收,王积翁上全闽八郡图籍率先归附。行省承制授知建宁府,后升福建道宣抚使、福州路总管兼府尹。至元十五年(1278)入觐世祖忽必烈于上都,“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寻除参知政事,行省江西”。^①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之为国信使,同僧人如智宣谕日本,方至其境即遇害于海上。王积翁被害后,元朝追封为敬愍侯。仁宗皇庆元年(1312)又加封闽国公,改谥忠愍,立祠祭祀。《王公祠堂碑》碑文即是黄潘受王积翁子王治中所请而作。^②

关于王积翁出使日本的研究,日本学界已颇多积累。较早者如池内宏在《元寇の新研究》中详细梳理了他出使的经过。^③除《元史》的记载外,着重利用《善邻国宝记》所引述《海印接待庵记》的内容,理清了王积翁、如智出使日本的行程。其后,魏荣吉《元·日關係史》亦曾专门论及王积翁的东渡问题,^④但不论是史料运用还是具体考述都未超出池

*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江南知识人群体的社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S024)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2062014259。

① 《元史》卷一八四《王都中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第4229页。

② 黄潘《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故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国信使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闽国公谥忠愍王公祠堂碑》(本文略称《王公祠堂碑》),《四部丛刊初编》影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元寇〉関連史料集(稿)Ⅱ 中国・朝鮮史料編》(平成18年度~平成22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礎研究(S)“長崎県北松浦郡鷹島周辺海底に眠る元寇関連遺跡・遺物の把握と解明”研究報告書,研究代表者 池田栄史,2010年3月,第99—100页)亦收录该碑文。

③ 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東洋文庫,1931年,第408—416页。

④ 魏荣吉《元·日關係史》,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5年,第203—205页。

内宏的研究。此外,田中健夫在对《善隣国宝記 新訂続善隣国宝記》补注和校订中,^①也对王积翁及其出使进行了注释,除增加了周密《癸辛杂识》的记载外,其他内容与前人研究亦基本相同。

本文拟在系统整理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利用未曾为学者所充分注意的《王公祠堂碑》以及《珊瑚木难》所收王积翁诗作^②和《鼓山志》的资料,^③着重对王积翁出使的由来和经过展开讨论,同时顺便提及他归附元朝的评价问题。

向来,学者们对元日关系的讨论多集中于“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两次忽必烈的征日行动上,尤其是“文永之役”前使者以及文书的往来方面,积累丰夥。^④但对其后的日元往来,包括第三次征日的准备以及之前的遣使活动,则相对不甚重视。而这其中,王积翁的出使则更似乎微不足道。如所周知,接收临安以后,元朝才真正实现了疆域上的“混一”。^⑤与此同时,忽必烈政权更将视野转向了海外,蒙元王朝也逐渐由草原帝国向海洋帝国转变。^⑥这一过程中,数次对南海诸国派遣使节,“宣谕”活动尤为活跃,一直持续到元末。^⑦由此,王积翁的出使日本也可视为当时积极海洋政策之一环。同时,这一政策对当时江南社会,尤其是对纳入蒙元帝国版图不久的江南知识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本文以归附元朝的江南知识人王积翁为个案来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窥斑知豹之效。

一、王积翁出使日本的由来

首先根据《王公祠堂碑》的记载来看王积翁出使日本的由来: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闽国王公以福建道宣抚使覲于上京,世祖皇帝与语,大悦。朝退,首命左丞张公即公寓邸传旨,询日本事。公对以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因画招徕之策以进,深契上衷。将使预闻国政,公恳辞,乃降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为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吕公为公起舞,霑醉而止。公既还治闽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举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礼有加,擢户部尚书。数奏事称旨。尝命之坐,而辍御膳以赐。以廷辩薄百官俸非便,忤权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将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条陈二十四事,丞相齐鲁国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年春正月,进

① 田中健夫編《善隣国宝記 新訂続善隣国宝記》,集英社,1995年,第92—94页,第544—545页。

② 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适园丛书》本。

③ 永觉元贤《鼓山志》卷四《沙门》,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④ 川添昭二《蒙古襲来研究史論》雄山閣,1977年。近年的相关研究可参见佐伯弘次《モンゴル襲来の衝撃》(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以及杉山正明《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第327—346页)。

⑤ 反映蒙元政权天下一统的“混一”这一用语,在当时的史料中频现。“乃是该时代独特的用语之一”(前掲杉山著作,第162页)。

⑥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 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書店,1992年,第245—256页。

⑦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113页。向正树《クビライ朝初期南海招諭の実像——泉州における軍事・交易集團とコネクション》,《東方学》116,2008年。

对,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计取,诚令臣得备一介之使以招徕之。事成,可无残民贖财,即事不成亦无损国威重,上嘉纳之。因以公为国信使,凡所须,一惟公意。

自至元十五年入覲上都至二十一年出使日本,其间六年,王积翁主要活跃于京师,所谓“覲北,留连甚久”。^①通过该史料对王积翁出使前行年的排比可知,他因熟知日本事为忽必烈所重视。但又因忤逆权臣,官途不顺。下文即在这两点的基础上,从忽必烈所重视的条件及其王积翁自身的希求来探讨王积翁出使日本的原因。

尽管两次征日失败,但毫无疑问忽必烈对征日一事仍极为留意,并积极准备第三次征伐,所以王积翁覲见后忽必烈便马上派人向他询问日本之事。但从目前可见王积翁的仕官经历看,并未见到他同日本或者海外活动相关史料的直接记载。首先可作推测的是关于他南宋灭亡当年被益王赵昰政权任命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剑州,“任责上三郡守备”的记载。^②而后至元十四年二月,“大元改福安府为福州,以潜说友为宣慰使,王积翁为副使以守之”。^③如所周知,唐末五代以来,福州即是东南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至两宋时期,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亦是南宋水军的重要基地。^④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益王赵昰即位于福州,当年十一月由此发舟入海,经泉州逃往广州。^⑤由此可以推测,南宋亡国之余,为逃亡政权所重用的王积翁,于福建任职期间对东南沿海各地同海外诸国、地区往来的情况当较为熟悉。由贸易商人或者往来僧侣处获得包括日本的海外诸国情报也是极为可能的。

另据《王公祠堂碑》载,早年南宋丞相吴潜分镇四明之时,王积翁即曾入其幕,辟奉国军节度推官,后改沿海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此后又为马光祖辟为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四明(宁波)、杭州向来更是宋、日交通往来的窗口,于此处获得日本相关的情况应更为便利。

王积翁之所以引起忽必烈的重视,除却他于四明、杭州、福州各地任职期间所获取的日本情报以及对日本之事的看法外,归降元朝的积极态度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公祠堂碑》提到他“以八郡图籍上之行省”,但并未透露具体细节。《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八《二王之立》载:

王积翁叛降元。先是,积翁弃南剑州,走行都,遣人纳款于元。至是,元军侵福安,积翁为内应,遂与王刚中同降。^⑥

该纪事同《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以及《广王本末》^⑦的记载亦相符合,都将其归降时

①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王积翁》,中华书局,1988年。

② 陈仲微《广王本末》丙子八月条,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

③ 陈桎《通鉴续编》卷二十四丁丑景炎二年条,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

④ 衣川強《南宋の海軍》,《羽田博士頌寿記念 東洋史論叢》東洋史研究会,1950年。

⑤ 《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第940页。

⑥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2页。

⑦ 前揭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第467页。

间系于丙子(1276)十一月癸丑。早于泉州蒲寿庚而积极同元朝合作,使得福州顺利归附,这应当是吸引忽必烈的重要一点。取得福州、泉州,南宋逃亡政权根本已失,这对于元朝迅速荡平南宋的残余势力至关重要。以此,在忽必烈持续关注日本之事的情况下,王积翁北上朝覲受到重视似乎也就成为必然了。

蒙元政权接收江南以后,充分继承了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机构,如市舶司的设置等。^①同时在札剌亦儿人唆都的主导下,利用蒲寿庚的海外关系网络,积极对南海诸国、地区开展了招谕活动。^②而对王积翁的重视应该也是运用了同一手段。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曾派遣台州临海人陈孚作为梁曾之副出使安南,关于选择陈孚的理由,《元史》作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选南士为介。朝臣荐孚博学有气节,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部郎中,为曾副。^③

除陈孚本身“博学有气节”外,当时择员出使,似有随行者须有南人充行的规定。是否一定为副使未尽可知,但江南知识人对忽必烈时期积极的海外活动当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使安南尚且如此,而从唐末以来即同日本保持密切往来的江南之地选择合适的使节也是极为合理的。也可以说,江南归附后,在忽必烈政权对日本及南海诸国海外交通中的重要性亦逐步加强。

以上是从元朝当权者的角度来考量选择王积翁出使的理由,而如果从王积翁自身的动机来看则又是另外情形。前引《王公祠堂碑》明确提及他滞留大都期间与权臣不合,官途不顺。从史料中的行年排比来看,至元十七年因“忤权臣意”而请求外任,至元十九年方有之官江西的任命。中间又为丞相劝阻勿行,直至至元二十一年进日本策出使为止,可以断定他滞留京师数年间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这一情况的产生同江南归附当初,初入政坛的南人同北人官僚之间的矛盾有关系。当时北人对南人入朝做官是相当忌恨的,并对他们力加排挤,赵孟頫即曾受此境遇。^④史料中提到的“忤权臣意”当即指此。为元朝征辟而起的江南知识人尚且如此,而作为南宋旧臣的王积翁在京师的境遇亦可窥知。当然,此处并未有意过分夸大当时南人、北人的对立。相反,包括赵孟頫在内的南人同北方知识人也有着良好的交际往来,^⑤而南下的北方知识人也多同江南知识人甚至南宋的降臣关系密切。^⑥但这也不可否认南方知识人在“混一”局面出现不久的朝廷中受到长期以来北人官僚占据优势的既成事实所带来的刺激。这一复杂的状况或许更能反映

①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参照前揭向正树论文。

③ 《元史》卷一九〇《陈孚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第4339页。

④ 陈得芝《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9页。另参见姚从吾《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1970年,后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 7 辽金元史论文(下)》,正中书局,1982年。

⑤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東洋史研究》56—4,1998年。

⑥ 潘柏澄《方虚谷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

出当时历史的真实背景。由此亦或不难理解作为南人人朝而受忽必烈重视的王积翁在被北人排挤后何以会积极上言出使日本了。

与此同时，至元十八年第二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亦积极筹备第三次征伐。而至元二十年复议时为昂吉儿所阻，翌年王积翁即适时上奏，力言招谕之策。这在当时或许是最易为朝廷所接受的方式，同时也符合忽必烈征伐前仍不放弃使节招谕的基本策略。但渡海出使的风险，王积翁通过在四明、杭州、福州等地的任职以及滞留京师时的诸多信息想必能够有所了解。尽管蒙元政权同日本的数次遣使往来中，使者基本上都可顺利归来复命，但周福和栾忠被杀以及作为第二次征日导火索的杜世忠被害事件王积翁心中应该也非常清楚。明知有此危险而依然积极前往，这也说明他作为前朝降臣渴求建功的心态。

此外，由于第一次征日失败后同日本数次交涉均未奏效，忽必烈开始将视线转至南海诸国。^①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诏谕总摄南海招谕活动的唆都和浦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②唆都则充分利用浦寿庚长期构筑起的海外通商网络，数次派遣使节前往海外诸国开展招谕活动。所以，由忽必烈积极展开的南海招谕活动所造成的当时社会风气对王积翁主动出使日本当产生了有力的作用。

此外，王积翁滞留京师期间，还曾建议开河运而为忽必烈采纳，但几无收效，最终罢废：

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令阿八赤等广开新河。然新河侯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罢新开河，颇事海运。^③

至元十九年还有奏请征旧南宋雅乐器至京师之议：

十九年，王积翁奏请征亡宋雅乐器至京师，置于八作司。^④

综合王积翁开河之议也略可窥见他作为前朝降臣积极参与朝政，努力融入到新朝统治之中的姿态。作为其一贯态度的延续，主动请求出使日本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二、王积翁出使日本的经过

关于王积翁出使的过程，《元史·日本传》载：

（至元）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积翁与补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一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不果至。^⑤

① 前揭高荣盛著作第三章《海外商贸活动的展开》及向正树论文。

② 《元史》卷一〇《世祖七》至元十五年八月条，第204页。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海运》，第2364页。

④ 《元史》卷六八《礼乐二》，第1696页。

⑤ 《元史》卷二〇八《外夷传·日本》，第4629—4630页。

《元史·世祖本纪》的记载则稍异：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遣王积翁赍诏使日本，赐锦衣、玉环、鞍辔；积翁由庆元航海至日本近境，为舟人所害。^①

而《王公祠堂碑》所载则于出使的路径及其遇害较详：

有旨命公视草，且赐公玉环、连条、纳瑟瑟袍、帽靴、马鞍各一，俾丞相善护视公妻子之留质京师者。公既陛辞，以夏四月发庆元，五月抵耽罗。耽罗人或劝公勿轻往，公不听。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令持旗榜谕其国中，并移书国主及用事者。日本遣来郊迎甚谨，请遂以诏书入。辛卯望，舣舟对马岛，丙夜，俄有举火噪欢岛上者，公竟遇害而薨。

结合上述史料可知，王积翁出使日本同行者为普陀僧如智，由庆元出港，其妻、子则留质京师。航行路线则为传统的“北道”：由庆元沿海岸放洋北上，经山东半岛抵朝鲜半岛南部济州岛，而后至对马岛。^②

《善邻国宝记》所引述如智《海印接待庵记》的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其行程：庆元→耽罗→合浦→对马岛。^③而向来为史家所忽视的《珊瑚木难》载有王积翁的诗作，可以更为清晰地还原沿传统“北道”航行中因风涛滞留合浦时情形：

日风水俱逆，波石相舂。舟人悸，久不定。晚出山外，始安。仆偃仰于短篷之下，偶成五言，并录呈似：

舟过道阳城，迂行多几程。俗殊难共语，山好不知名。櫓趁之玄势，歌调欵乃声。来晨宜对月，合浦夜珠明。

十八日甲子积翁书。^④

由此王积翁仅存的诗篇可知，十八日（应为六月十八日）尚宿于合浦。与如智所记亦大致相符。

而《王公祠堂碑》却提到，七月王积翁一行即已至日本境上，并递交了国书。通常，蒙古、高丽派往日本的使节往往到达太宰府进行文书的交割。而依据碑文的记载，似乎他们先至太宰府而后方停舟对马岛，当夜王积翁于此遇害。可是如果按照如智记载，这一路线

① 《元史》卷一三《世祖十》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条，第264页。

② 屠寄《蒙兀儿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一〇二《王积翁传》认为自庆元赴日本不必经对马岛。尽管未列证据，看来他仅知自庆元横渡东海直九州南部这一南线航路，于北路则不明。通过下文如智以及王积翁的记载，他们所行定为北路无疑。第694页。

③ 前掲田中健夫编《善隣国宝記 新訂続善隣国宝記》：“甲申四月，又奉圣旨，同参政王积翁再使倭国。五月十三日，开帆于鄞，住耽罗十三日，住高丽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对马岛。云云。危哉此时也。非大士孰生之。云云。”第92页。

④ 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适园丛书》本。

实不可解。而《元文类》亦载：

日本海国自至元、大德间黑迪、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积翁、释如智、宁一山与高丽之潘阜、金有成辈数使其国。惟积翁中道为舟人所杀，余皆奉国书以达，而竟不报聘。^①

此处也明确言及王积翁所携国书并未送达日本。由此可断定，《王公祠堂碑》所记至日本人诏书一事当为王积翁后人据逃回人员或其他传闻误入的内容，难以凭信。

关于王积翁遇害对马岛，池内宏已据《海印接待庵记》作出了判断。^②现据《王公祠堂碑》“辛卯望，舣舟对马岛，丙夜，俄有举火噪欢岛上者，公竟遇害而薨”所载亦可进一步加以证实。而其具体细节也因《善邻国宝记》引用之际以“云云”而略去，颇为遗憾。对此，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到：

王积翁留耕，参政伯大之侄也。尝宰富阳有声。后覲北留连甚久，遂自诡宣谕日本。遂命为奉使，以兵送之。至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尽拘用之。使行，又于途中鞭之。有诮语，王颇闻之。至骸山，即骷髅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且作大茶饭享之。任亦领略，亦作酒以报众。使醉饱，任纵兵尽杀之，靡有孑遗。王窜匿于柁楼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犹佯笑曰：在此。出则叩头乞命，任顾其徒，鞭而挤之于水，席卷所有宝物货财货去，取所乘舟，断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后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为之立庙赐谥焉。^③

据周密所记，王积翁被害是由于他与舟人矛盾所致，遇害地点在骸山，即骷髅山。但该山地名暂不可考，如果参照《海印接待庵记》和《王公祠堂碑》的记载，当就在对马岛附近。

最后对普陀僧如智充使问题稍作补充。如《元史·日本传》所载，“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积翁与补陀僧如智往使”。对此，池内宏认为，这不过是此前以范文虎、夏贵建议遣周福、栾忠同日本僧侣出使的继续，而如智又同日本商人、僧侣颇多交往，故派遣之。而蒙元当权者并未真正顾及到日本“其俗尚佛”传统。^④其实现存文献中，王积翁同佛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清人所编《鼓山志》载：

至元十年冬，元朝开国大帅王积翁请（佛鉴圆照大师）住本山堂中。^⑤

可知王积翁同元代天台宗佛鉴圆照大师亦曾有过交集，同佛教颇有渊源。另外，王积翁被

① 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一《日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

② 前揭池内宏著作，第399页。

③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王积翁》，中华书局，1988年。

④ 前揭池内宏著作，第399页。

⑤ 永觉元贤《鼓山志》卷四《沙门》，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害后,其夫人则“削发为尼,住妙湛寺,朝夕诵经礼拜归诚于佛”。^①这应该同其家庭与佛教渊源有关。所以,忽必烈在派遣王积翁同如智一起出使时,对于日本重视佛教传统这一点应该是作了充分考量的。

三、代结语

王积翁被害后,元朝追封为敬愍侯。禄其季子王都中为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即平江赐宅一区,田八千亩。仁宗皇庆元年(1312)又加封闽国公,改谥忠愍,立祠祭祀。同朝廷的彰显相比,江南知识人的反应则较微妙。上引周密的记载中可明显读出他对王积翁轻视的意味。而作为江南遗民群体中声名较著的牟巘反倒较为宽容,并为其撰写《敬愍侯祠记》。这也是符合当时江南知识人群体整体动向的。周密向来以前朝遗民自我标榜,道德评判的倾向较强。他在《癸辛杂识》中对归附元朝的徽州人方回更是极尽抨击之能事,而大多数的江南知识人则仍然同方回保持着较好的往来和诗歌唱和。^②王积翁的情况应该也与此相类。在经历宋元交替后的元初知识人群中,除却遗民意识较强的谢枋得、郑思肖等,多数的江南士人对归附元朝者仍保持了较为宽容的心态。

可是至明清时期,这一局面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呈现了一边倒的道德批判。方回自不待言,王积翁亦是如此。而批判焦点则主要在他前朝降臣的身份上,并以此来贬低他出使日本的行为。由元入明的鄞县人郑真在分别列举陈仲微《二王本末》以及黄潘所撰《王公祠堂碑》王积翁的事迹后评述到:

合二者所载观之,其叛君卖国之罪不容诛矣。……祠堂碑言日本事颇详备,且以捐躯殉国为忠,其迹为近似矣。夫忘故国累世之恩,而希新朝一旦之宠。故不死于宋而死于元,盖亦贪生而终不得生,畏死而终不免死者,果何取于捐躯殉国者哉。^③

至清代全祖望则因鄞县西湖旁建有王积翁祠而讥之曰:“叛臣王积翁之徒立祠享祀,而湖上之风流尽矣。”^④无不贬斥王积翁归附元朝,并将出使日本视作他邀宠新朝之举。而其言辞亦可谓辛辣之至。

本文无意为王积翁等归降元朝的官僚、知识人群体做翻案文章,仅从当时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境遇出发,尽可能在探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以求更为全面地展示当时复杂的政局以及时代变迁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在儒家正统观念下,王朝更迭对知识人的心理以及行为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明清以后儒家性理观逐渐强化,特别明代中后期“北虏南倭”外部环境的紧张,这就使得宋元更替之际知识人的境遇及其选择成为后代

① 牟巘《陵阳先生集》卷一一《敬愍侯祠记》,《吴兴丛书》本。

② 参见拙稿《〈癸辛杂识〉之贺诗风波——论方回的人品及其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③ 郑真《荜阳外史集》卷三七《读王积翁遗事》,《四库全书》本。

④ 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一八《水云亭记》,《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

儒家学者竞相标榜抑或鞭挞的对象。^①所以,明代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江南知识人对《宋遗民录》的编纂一直不遗余力。某种程度上,宋元更替对后世的意义已远大于对当时知识人所产生的影响。在此问题意识下,从整体上全面对当时类似于王积翁、方回等归附官僚、士人群体进行研究当为今后不可忽视的课题。

Discussion on A Diplomatic Envoy Sent to Japan led by Wang Jiwong Based on the Stele of Wang Family

Yu Lei,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actively preparing the third expedition to conquer Japan, after two failed attempts, Kubilai Khan sent Wang Jiwong, a Fujian local person, to Japan as a diplomatic envoy. There were two reasons for chosen him. Firstly, Wang's unsuccessful political career pressed him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dynasty. Secondly, Kubilai Khan highly regarded Wang's active attitude and the information he collected during his career in Siming, Hangzhou and Fuzhou. For the process of the visit, the *Shanhu Munan*, a largely unnoticed primary source, provides som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ip, including Wang's sojourn in Hepu. As for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Wang from his surrender to the Yuan and his diplomatic visit to Japan, contemporary literati generally had a tolerant attitude. But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when the Neo-Confucian doctrines were entrenched and new conflict arose in the North with the Mongols and the South with Japanese pirates, literati overwhelmingly criticized Wang from the mo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the Stele of Wang Family; Wang Jiwong; Envoy to Japan; Surrendered Minister

（本文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与该问题相关联,明代中期以后明人的民族情绪高涨,明朝政权以及知识人群体对蒙古统治特别是元明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参见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元代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网络的研究

——根据伊斯兰教石刻年代、地理的分析

(日本) 向正树

提 要: 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现的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墓石记载了墓主人的出身地。其中伊朗北部和河中地区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地方曾是花刺子模王国的统领地区。在这些墓碑上,被视为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死在异乡,即为殉教”及其同类铭文反复出现。有意思的是,在泉州,存在着可视为同种铭文原型(Archetype)的南宋末期的碑文,其铭文显示与花刺子模地区有关。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异国人穆斯林精英层中,在占据相当比例的旧花刺子模王国出身者之间应该是共享了这种将“异国人”和“殉教”联系起来的传统。

关键词: 伊斯兰教墓石 沿海地区 花刺子模 精英 殉教者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海域各地区的伊斯兰系集团,是不是在历史上因海上贸易而联系在一起?其联动性与关联性,值得探讨,惜其文献学研究受史料制约非常大。结合对碑文史料信息之研究成果,笔者感觉到我们可以明确他们跨越国境性的关系的部分具体情况。2005年至2013年间,笔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进行了间歇性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在于搜集当地现存的伊斯兰碑文(主要为阿拉伯语墓碑)中的年代性、地理性信息,并结合相关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资料一并做详细分析。本稿将在此成果基础上,对13~14世纪及其前后时期该地区的伊斯兰系集团的社会情况进行初步研究。

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北京、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和广州境内,发现了很多来航并定居在元朝统治下的这些港口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石。它们记载了墓主人的出身地和卒年,并附有包含了波斯语、土耳其语、汉语要素的阿拉伯文铭文。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可以明确以下内容。

首先,这些墓主人的出身地分布在新疆、河中地区(Transoxiana)、伊朗、呼罗珊、花刺子模、亚美尼亚、叙利亚和阿拉伯,而意外的是,完全没有显示出身地为印度和东南亚的墓石。由此可以判断,身居港口城市群的伊斯兰集团中,实际上中亚性的要素是不容忽视的,这有些令人意想不到。在这些墓碑上,与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箴言警句相同的多种铭文反复出现。而这些只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和广州才可以看到。有意思的是,在泉州,存在着可视为同种铭文原型(Archetype)的南宋末期的碑文,其铭文显示与花刺子模地区有关。这些碑铭学上的新发现,在上述历史背景中到底有何意义呢。